

評路康樂·「中國之共和革命——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之廣東」

呂芳上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66 pp.

Appendix: Maps, Notes, Bibliography, Glossary and Index.

(一)

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史的第一個大課題，國內有關辛亥革命史資料的蒐藏與刊布，可說豐富詳盡，但有效運用現有資料，作專題區域性研究的，則還不多見。近年來美國學者，對中國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則十分可觀。即以特定區域為範圍，對這一題目已完成專著的，至少包括了下列各區域：江浙、四川、兩湖、江西、雲南、貴州及廣東等地。（註一）這種區域性的研究成果，常可提出對同一事件在不同地區發展的相同性與殊異性，也可提出在同一地區，不同時間、不同事件產生背景因果性與同異性，這在歷史學的比較方法上，尤其可以顯出積極的意義與貢獻。

辛亥革命的動力起於革命團體的組織，中山先生以粵人，首先以興中會利用廣東為基地發動起事，其後的革命同盟會，仍然以廣東為革命的大本營。故而研究辛亥革命，以廣東省為範圍，作個案研究，自然是一十分適切的選擇。目前在美國的學者，以辛亥前後的廣東為專題，已出版專著或完成論文的，至少有三人：傅禮門（Edward Friedman）、謝文孫及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傅禮門對辛亥汕頭光復經過曾有專文發表，一九七四年更出版了一本有關「中華革命黨」的專書，對

民初廣東的革命活動有相當研究。謝文孫對民初廣東民軍、惠州起義及珠江三角洲的歷史，有獨到的見解。至於路康樂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專著：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三年之廣東，就是本文評介的對象。（註二）

(二)

路康樂，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德州大學副教授，一九七五年本書列為哈佛東亞系列叢書第八十一種出版。全書除正文、注解、參考書目、詞彙、索引等共三六六頁外，另附珠江平原及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之廣東地圖各一幅，可說是一部典型區域研究的專著。全書除前言結論外，共分十章，在時間上，作者以庚子拳變（一九〇〇年）為基準，分前後兩部份敘述，拳變後十年更以改革與革命的激盪，民族主義與立憲論的勃興；到大革命的爆發，作了詳盡的分析。民國成立後近兩年的時間，廣東在革命黨人努力下，亟力造成「模範省」的經過，到袁世凱叛國二次革命失敗，廣東恢復舊觀為止，辛亥革命的結果已幾如曇花一現，本書敘事至此也告結束。

革命本是一種非常的破壞與非常的建設，作者在緒論中也指出，革命乃是針對一個政府或社會，用暴力所作的改變。反之，非暴力的變革，不管它多廣泛多激烈，也只能說是一種改革（reform）而已。因此對中國來說，興中會以後的革命團體所進行的活動，當然是革命，而從事改革運動的立憲派，則充其量只是「改革派」（Reformists）罷了。通常遭受內外壓力導致社會系統不平衡（disequilibrated）的國家，是走向再適應（resynchronization）或造成革命情勢，端看領導階層能否採取適當措施。庚子年與辛亥年是清廷兩次大的危機，作者以為庚子拳變後，因為清廷適應得法，消融了革命情勢，辛亥年則因統治者的冥頑不靈，招來大革命的爆發。革命的結果，革命黨是否一定能獲利呢？並不盡然，除非消除反革命的因素。中國二次革命的發生與失敗就是一例。

第一章，變動的前夕，作者首先介紹廣東的地理與人文環境，說明廣東在中國各省中雖算是與西方接觸較早的省份，但在甲午戰前，基本上仍是傳統性的社會。儘管也有少數現代化的設施如報業、教會學校或西醫；也有極少數覺醒的知識份子，如何

啓、鄭觀應等，但影響都不大。

第二章，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間的戰後時期，作者指出中日甲午之戰暴露了中國自強運動的弱點，同時也開啓了近代中國的序幕。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迫使清廷採取進一步的改革嘗試，但戊戌維新的失敗，也使滿懷雄心的改革家走向了革命。廣東變成了革命的基地，一八九五年二月香港成立興中會分會，據作者的 analysis，參加的知識分子，大都是年輕，受過西化教育，或與西方有過接觸的基督徒。（頁三十九）這與其後康梁的保皇會相較，幾同屬於受挫的改革家所組成，同是對抗清廷的兩大陣線，但保皇會份子大部屬於傳統士紳的這一背景，便大大影響了日後兩派觀點的分歧與合作的可能性了。

第三章，拳變後十年之前期，約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清廷在拳變後，開始採取新的適應措施，即以廣東而論，在陶模與岑春煊主持粵政時期，即有許多新的改革，如一九〇一年起設立新學堂，一九〇二年陶模資送二十位留學生赴日習師範，兩年後岑春煊也資送五十六位留學生赴日攻習法政，張竹君的廣東女學、杜清池的育賢女學創立了，放足運動漸漸普遍。軍事上黃埔武備學堂、廣東將弁學堂及新軍制都在這一時期開始建立。公共建設方面，一九〇三年廣州架設了電燈、電話，現代化的設備總算起了一小步。不過這一時期外力日亟，清廷的改革，仍不能滿足一般人士的要求，民族主義隨之滋長，學生、商人逐漸覺醒。這個時候興中會在港、粵最顯著的活動是中國日報的抨擊清廷稗政，有意思的是陶模督粵時期（一九〇一年二月至一九〇二年九月），廣東督府本身即訂閱了兩百份中國日報。（頁六十六）這一時期除了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外的兩次革命活動，一是一九〇三年一月洪全福「大明順天國」之役，二是一九〇五年四月徐雪秋潮州黃崗之役，但都失敗。同樣的，保皇會在港、澳地區也有宣傳活動。

由一九〇五年到辛亥革命是本書的重點，所佔篇幅最多，敘事也最詳盡，第四、五章記述拳變後十年中期的改革與革命運動。由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作者舉出影響重大的三項變革：新學堂、新軍及商會的建立。一九〇五年九月科舉制度的廢除，動搖了傳統儒家在政治系統上的地位，也促使新式學堂的普遍建立，以數字為證：一九〇七年全省中學堂有二十五所，學生二六〇〇人；小學堂一四四一所，學生六五九·六八六八人，女學堂二所，學生三九一人，值得注意的是舊社會的士紳，仍然依

附於新式學堂，甚至於左右了教育行政權。（頁七六）新軍的建置，本是全國性的軍事改革計劃，岑春煊、周馥對廣東新軍的創建有貢獻，新軍改正了舊巡防營的缺點，成員來自全省中上之家的「精英之士」(Elite group)，水準高，素質好，地方關係強化了社會關係，得到人民的敬重，地位大大的提高，日後革命黨滲透到新軍中，造成了革命的有利因素。一九〇五年七月廣州成立「商務總會」，出版總商會報，建立產品陳列館，協助中國商人與帝國主義者競爭。廣州商會在性質上確成為商人、企業者公認的發言人，是「行」與政府的中間人，也是商人與官吏間的橋梁，因此直接使商人有了自尊心與獨立感，大大改變了傳統商人的地位。由於學生、新軍、商人地位的普遍變化，促進了這批人對政治公共參與的精神，表現在一九〇五年五月抵制美貨運動，一九〇六年粵漢鐵路利權之爭及同一時期的立憲運動、地方自治運動的事實，已足以說明一切。

同時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八年也是革命黨最活躍的時期，這與同盟會的建立自然最關重要。依作者的分析，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有資料可稽的一一一位廣東同盟會會員中，依地域分：來自珠江三角洲的有四十八人，來自梅江河谷的有五十人，其他十三人分別來自西江、北江、東江及韓江流域。（頁一〇二）他們又以客家人居多數，這可能與客家反異族統治的傳統有關。會員都很年輕，在可知的三十三人，平均年齡為二十四歲。廣東留日學生很多，但是加入同盟會的則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他們在同盟會中都是優秀而活躍的幹部人物。就家庭背景看，廣東籍的同盟會員大都出身良好，甚至於有的已得過功名的，他們之加入革命組織，是值得玩味的：一般而言，是對清廷內政腐敗，外交屈辱無能感到不滿；就個人因素看，劉思復與劉越航，胡漢民與胡毅生，何天炯與何天瀚，何毅與何斌，謝延譽（良牧）、謝延美、謝延祉與謝延惠，都是靠家族親戚關係，集體加入的。也有靠同學關係加入的，例如法政大學的朱執信、汪兆銘、金章、杜之林、古應芬、胡漢民、張伯喬就是一例，當然風氣使然也是一個主要因素。這一時期革命黨的起義達七次之多，大體上是由知識分子領導，而以綠林及會黨為起事武力，作者以為，當時仍因缺乏有利的革命情勢，故不能對清廷構成大威脅。

第六章至第九章，作者分析拳變後十年的後期，討論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革命前的民族主義、立憲論及革命運動。指出清廷雖有新的改革與建樹，但是由於人民政治意識普遍覺醒，民族主義也相對膨脹。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反對英艦巡邏西江案；

一九〇八年二、三月間，反對粵督屈服於日本的「辰丸二號」案；十一、二月間葡警在 Fatschan 號輪誤殺中國人引起的爭執，及次年澳門勘界引起的反葡運動，直接間接都導致了廣東人民對清廷的離心力，大大有利於革命的發展。但是，作者以爲：幸而一九〇九年立憲運動的推進，才引導了一部分激烈的紳商轉入了諮議局。

一九〇九年春，廣東依照規定進行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全省依法登記有選舉權的共一四一·五五八人，約占全省人口的〇·五%，每一五五五人選一人，共選出九十一名，（仿照美國行複式選舉法），據統計，投票率大約爲百分之五十，有許多舞弊不法的穢聞。在有資料可複按的名單顯示，議員大部分仍出自士紳階層，平均年齡大約也在四十一、二歲之間；（頁一六一）諮議局自一九〇九年十月起至革命前召集過三次正式大會、兩次特別會，討論全省社會、政治、教育等案多種，其中以禁賭案爭執最爲激烈。此外各地方自治運動也相繼開展，但據作者研究，一般而言，這些憲政運動，商人與士紳受惠最多，居大多數的農民，則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例如增加稅捐等就是一例。

由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間，革命起事活動較諸前期爲少，主要是同盟會本身遭遇了若干困擾，削弱了反滿的力量。廣東這一時期陳少白、馮自由、葉楚傖、黃世仲、莫紀彭等的報刊、小說或劇團，擔任了革命宣傳的任務。值得注意的是同盟會員或以教書作掩護，或潛伏在諮議局、民間社團，或滲入新軍中，進行活動，因此而有一九〇八年的防營之役，一九一〇年的新軍之役，及一九一一年黃花崗之役，事雖不成，但大動視聽，影響很大。作者以爲這時期清廷的改革立憲運動，消融了部分革命勢力，不過，也承認，不休止的革命活動，造成革命最後的成功。

依照作者的看法，拳變後清廷的改革，確實化解了許多可能造成革命情勢的因素，因此辛亥革命以前幾次起事之所以不能成功，其因在此。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既散漫又無組織，而革命却一舉成功，作者以爲這是革命情勢使然。辛亥革命前革命「情勢」的造成，作者歸功於下列因素：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第三次國會請願失敗的挫折，同一年的去留髮辮之爭，以及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自掘墳墓的三件大事：滿族內閣、鐵路國有政策和粵漢路四國銀行團借款。這些因素，迫使原支持清廷改革的非革命黨士紳也走向了革命，革命終致成功。第九章作者即以廣東辛亥光復經過爲例，證明這一值得商榷的說法。

第十章，革命與反革命。分析二次革命前後的廣東省政與社會文化變遷。作者對民初革命黨人主持廣東省政二十一個月的成就，極致好評，認為確實造成了一「新廣東」的局面。在政治上都督府人才輩出，年紀輕（平均二三十歲）、素質佳（大部分是留學生）、幹勁足、衝力大，因此解決了不少棘手的問題，例如：民軍的整理，治安的恢復，財政的挹注，帝國主義者敵視的應付等，都見其效。尤其意義的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起集會的省議會，有女性代表十人參加，是中國也是亞洲民主制度的創例。而民國元年六月在廣州推行清地籍換地契的措施，更是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第一次具體嘗試。（頁二五七）在廣東的一批同盟會革命志士，真是不斷的為理想而努力。

在社會文化方面這時期也有重大變革，民間社團急速增加，政治組織在廣州至少有六個政黨及兩個組織：民主政黨、民治黨、共和黨、社會黨、進步黨、同盟會以及晦鳴學社與心社。國語逐漸流行，小地域觀念也漸泯除。去辮子、著西服、行陽曆、注意公共衛生、禁煙禁賭、確立司法制度及行政體系，提高婦女地位，大建築紛紛興建，許多五四時代的特徵，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了。新廣東的面貌確與過去迥然有異。不過，作者進一步指出，儘管如此，居於大多數的農民，則仍未被重視，因此這仍然不是社會革命，最多只是偏向商人的城市傾向的政治文化革命，（*a urban-orient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volution*）。（頁二五九）

就廣東而論，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財政的困難，因為財政赤字急劇增加，迫使向外借款，不足又求之於中央，原有的獨立性遂告消失。幣值的不穩，影響了商人的支持，也影響到軍人的服從，因此二次革命爆發，陳炯明宣佈討袁，既得不到商人也得不到軍人的支持。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入主粵省，一切又回復了舊觀。辛亥革命猶如曇花一現。

不過，作者在結論中平實地指出，辛亥革命再不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循環，它至少包括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狹義的推翻滿清專制政體的政治革命，由日後袁世凱帝制終歸失敗，證明專制政體永不復返；另一方面又是一八九五年以來儒家價值系統變動的廣義文化革命，因為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年，商人趨於獨立，社會平等主義漸流行，——包括青年婦女地位提高，民族主義的滋長，城市傾向化，趨向於西方思潮，對新事物的愛好等，已為五四鋪路，因此就政治文化的全面意義而言，

作者歸結說：這一時期正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水嶺。(The Watershed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ina)。

(二)

正如前節所述，這是一部區域專題研究的典型著作，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廣東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尤其從傳統走向現代，由改革到革命，這一步步艱辛的路程，這部書的記述，算得上是取材豐富，記載翔實的了。在時間的取斷上，也大體適當，以革命爲主題的著述：一八九五年，除了中日甲午戰敗刺激的意義外，與中會——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香港分會正式成立於這一年，中山先生領導下的第一次革命起義也正是在這一年九月在廣州發動的。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使革命中挫，革命黨多年的努力，幾乎全部付諸流水，龍濟光率客軍入主廣東，政制恢復舊觀，敘事至此也可暫告段落。在結構上，全書以拳變爲基準作分期，雖稱勉強，但作者以敏銳的眼光尋出每一時期的特徵，以一主題統攝全部的史實，進而說明這一特徵，加上了緒言與結論。對革命理論的呼應，倒也顯得緊湊完整。

不過本書在某些立論與內容上，仍頗有可議之處：

其一：清廷的改革是否真消融或緩和了革命的勢力？答案是否定的，即以清廷讓步最多的立憲運動而言，立憲派人士的要求，清廷大都逐步接受，但辛亥革命前許多立憲派人也轉入革命，就辛亥革命爆發後的事實證明，立憲派早已爲革命儲備不少實力。清廷其他重要改革諸如新式學堂的建立、留學生的派遣、新軍的建置等，原來的初衷無不是爲鞏固清廷政權，但結果也都成爲清政權的催命符。日本學者橋樸曾說：「清廷的改革，原期延長國祚，結果適得其反，派遣的留學生，大部變成了蓄有民主思想的革命者；編練的新軍，則變爲反滿革命的溫床」。(註三)這原因何在呢？可以引革命時期革命黨所引用美國學者威曼的解釋來說明：「革命也者，由人民、政府相爭而成。其相爭也，不必在政府壓制極盛之時，而亦有在政府改惡從善，欲行小惠以市民望之時。何者？政府自知壓制不可久，而民心不附己也，因思少殺淫虐，苟以市德。無如民智既開，進取愈勇，羣謂政府之中，雖自行釐整舊習，終不能盡如人心。不如破壞決裂，無復少存昔日之制，而成一大變革之功之爲愈也。當政府少

殺淫虐，人民初嘗自由之時，益真知灼見壓制之不可須臾復忍，是以仇視政府之心，較壓制極盛之時為尤甚也。」（註四）

其二：作者在本書中，不只一次的提出一個基本概念：革命的先決條件：革命情勢遠比革命黨更見重要。（頁四、二七四—五）換句話說，作者以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在革命黨努力的結果，而是清廷統治者自身頑固腐敗，不能得到非革命黨士紳支持的結果。基於這一看法，他提出證明說：當同盟會強大健全，活動激烈的時候（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起事結果總歸失敗；相反的，當同盟會分裂散漫之際，武昌起義，革命却一舉成功。這一似是而非的論斷，正好犯了區域研究的大忌——以偏概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大弊。這一看法也有意無意間貶低了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同盟會在革命史上應有的地位，當然是件極值商榷的事。

本來革命情勢的造成，原因十分複雜，清廷措施失當導致立憲派黨人轉入革命，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還有賴於革命黨人的鼓動激盪與擴散。擴大革命風潮的辦法不外乎靠文字，或以口頭進行宣傳，更要緊的還是以實際的行動激發革命情勢。歷次的起義或暗殺行動，正是革命黨人以具體典範示人的辦法。具體的起事縱然失敗，但無形的影響則極為重大。一八九五年廣州之役，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一九一〇年新軍之役，一九一一年黃花岡之役，革命行動一次比一次壯烈，其影響也層層的擴大，其有造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實在是不爭的史實。也就是說辛亥年的革命情勢，是同盟會歷次起事，分途發展的結果。

就同盟會本身而言，自一九〇五年成立起就是以中山先生為中心的革命團體大聯合，在組織上自始就顯得較為鬆懈，它的重心又常隨領導人的遷移而變動。（註五）三二九黃花岡之役以前，大體上以東京、南洋或華南為重鎮，之後則轉移到華中，與同盟會有主屬關係的「中部總會」的成立，就是這一趨勢的最好說明。實際上在三二九之前南方支部已透過譚人鳳、居正、宋教仁、黃興等人的關係，與長江流域革命團體有所連繫，等到三二九之役失敗，南方支部遭受重大打擊之後，革命黨的重心實已逐漸轉移到華中。一九一一年七月底「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方分會為友邦」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正是黃興「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寧皖陝蜀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計的實現（註六）。這時文學社與共進會也成了中部總會的分支機構，更與兩湖革命團體聯成一氣，革命大勢，至此實已形成。何況辛亥前同盟會在國內本已有二十一個支部，其分布於華

中者八，華南者六，華北者五，東北者二，辛亥前革命黨實已在全國各地發展生根了。

當辛亥革命爆發後，同盟會又扮演怎樣的角色呢？一個最顯著的事實是，各地響應革命的團體或個人，大都與同盟會息息相關。據張玉法先生的研究，武昌首義後，全國各地三十一個重要革命事件，約百分之六十由同盟會或其會員直接發動，百分之二十與同盟會稍有關係，另百分之二十係由同盟會與光復會、共進會合作的結果。（註七）另外至少有兩個軍政府的外交宣言，是與同盟會的革命方略相同的。（註八）這些都在在說明了同盟會不只是清末革命運動的核心，而且也是辛亥革命的主軸。尤其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後，又因著同盟會的聯繫，而使國家趨於統一，免除了中國歷史上羣雄割據的可能局面，關係之重大，實不待言。

其次再就廣東而言，三二九失敗後，部分黨人雖經離散，但南方支部並未完全解體，這時候朱執信仍坐鎮香港，主持一切，並思捲土重來之計。武昌起義後，朱執信即迅速集結民軍響應，更一面派人運動諮議局，一方面與李準接洽反正，迫使採取觀望態度的官紳，迅謀獨立，造成廣東光復的有利形勢，其後也終使廣東在同盟會黨人掌握下，得予順利光復。這些都說明了辛亥革命的完成，同盟會在全國各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絕不容漠視的。

其三：就廣東社會論廣東革命，本書至少還忽略了兩個重要因素，一是以綠林會黨為主幹的民軍，一是華僑。中山先生首倡革命，初引會黨為革命武力，與中會時期陳少白、尤烈、謝纘泰、程奎光都是會黨分子，同盟會時期的起事，也都靠會黨綠林完成，（註九）這批人在廣東的組織如何？會黨與綠林的關係如何？以綠林為成員的民軍，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如何？都還缺乏深入的交待。至於華僑與革命的關係是人所周知的，廣東尤其是各地華僑的祖籍，他們除了捐獻鉅款補助革命經費外，還親自回國參加起義，他們在廣東歷次起義的貢獻、意義都還值得探究的。

當然本書在資料上，作者已充分運用史學上多種語文，多種檔案的原則，臚列的史料堪稱豐富。縣志、族譜本是中國史學的兩大寶藏，作者在本書中至少使用了二十二種以上的縣志，有條不紊的提供了廣東各地走向現代化的步調。港粵因位居中國沿海，得風氣之先，中西文報業發達，作者也充分使用香港出版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華字日報（Hah Tsz

Yat Po)、香港電訊報(Hong Kong Telegraph)及上海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此外，作者在本書中還利用過五種重要檔案：美國務院外交檔案(DS/CD, DS/DF, DS/NF)、英國外務部檔案(FO)、中國外務部檔案(南港近史所藏)、嶺南大學檔案(哈佛燕京社藏)及長老會外國傳教檔(紐約)，補充了的史實，例如陸皓東、史堅如起事失敗被捕後，曾獲基督教長老會透過美國領事援救不果的史實，(頁四〇・四五)，又如辛亥廣東光復後廣州英領事James Jamieson，美領事F. D. Cheshire對廣東督府的不友善態度，都是中文資料不易獲見的。不過，在中文資料的利用方面，本書仍然不無遺珠之恨：中山先生以粵人領導革命，三二九之前的革命運動，衆所週知是偏重西南邊區或即在廣東境內進行的，當然直接間接都與中山先生有關，「國父全集」中提供了不少革命活動的原始文件，羅家倫主編的「國父年譜」，雖非盡善盡美，但也提供很多基本史實，但作者的書目中就不會引用，結果一八九五年春中山先生在廣州設立「農學會」——假農學研究之名，行革命之實的重要機構，(註一〇)，在以廣東革命運動為主題的專著中，竟然付諸闕如，豈不令人驚訝。另外台灣公私機構所藏的資料，包括上海的民立報、天鐸報，(于右任、戴季陶等革命黨人主持，與廣東革命黨人時通聲氣)，嶺南半翁的「辛亥粵亂彙編」，民國元年中國同盟會粵支部雜誌等等，都是研究廣東革命史所不能不看的重要資料，而作者却都未能充分利用，難道不是一件憾事嗎？

本書提供史實堪稱豐富，但在運用資料的細節上，仍難免有小疵，特舉出提供參考：原書二四二頁謂「中國日報」創刊於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六四頁又謂為一八九九年，論其出版，當以前者為是；一〇三頁作者謂朱執信父親擁立功名，實無，朱啓連傳在番禺縣續志中有載，當可複按；又革命文獻第二輯所載同盟會會員名單，廣東會員杜之杖，誤為杜之「杖」，本書亦以杖(音第)為杖(頁一〇二・三五五)未加更正。在附錄的詞彙欄(Glossary)內，誤植之中文字亦多，最顯著的如以譚延闓為譚庭闓、以汪精衛為江精衛、以楊衢雲為揚衢雲等，對一個外國學者而言，此或不足苛求，但對一本夠水準的學術著作來說，寧可求之稍嚴。

附註

- 註一：這些專著的已發表，有的是已完成的博士論文。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ng, 1902-1911, Cambridge, 1971.
- Charles H. Hedtke, "Reluctant Revolutionaries: Szechwan and the Ch'ing Collapse, 1898-1911",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peh",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1.
- Samuel Yale Kupper, "Revolution in Chinese: Kiangsi Province, 1905-1913",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William R. Johnso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of Yunnan and Kweichow",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2.
- 註二：劉川波譯，中國革命史。
- Edward Friedman, "The Center Cannot Hold: The Failure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in China 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to the World War in 1914."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Ph. D. Dissertation)
- "Revolution of Just Another Blood? Cycle? Swatow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2: 289-307), (February 1970).
-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Winston Hsieh,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Kwangtung",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 "Peasant-Benefits in Towns and Cities: The Phenomenon of People's Army in Kwangtung, 1911-1924, 1968.

Winston Hsieh, "Triads, Salt Smuggles and Local Uprisings: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Waichow Revolution of 1911", 1972.

Edward J. M. Rhoads, "The New-Kwangtung: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895-1911",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Edward J. M. Rhoads,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Kwangtung (1905-1906): The Canton Anti-American Boycott and the Lienchow Anti-Missionary Uprising", *Papers on China*, 16: 154-197, (1962) Harvard University.

註三：橋樑：中華民國三十年史，頁四〇，轉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一一〇，（台北，六十四年二月出版）。

註四：威曼：「革命新論」，載「國民報彙編」，頁一四八，（一九〇四年出版）。

註五：參見鄭憲博士的分析：Shelley Hsien Cheng, "The Tung-Meng-Hui: It's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and Finances, 1905-1912", Ph. D. Dissert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2.

註六：黃興致馮自由書（民前一年八月十四日），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七三，（台北，六十二年十月增訂本）。

註七：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四五九，（台北，六十四年二月出版）。

註八：見開國五十年文獻，「各省光復」，（下），頁九六—九七。

註九：參見鄧嗣禹：「海內外會黨對辛亥革命的貢獻」，載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五冊。

註一〇：一八九五年春，中山先生在廣州設立農學會，表面上研究農業以致富強，獲得粵中官紳潘寶璜、潘玉琳、劉學詢等數十人的贊助，實際則從中吸收革命同志，使加入興中會，先後在廣州填寫誓約加入的有尤斗山、程奎光等數百人。參見國父全集：「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六七—六八。